

试论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及其性质

王 俊

(安徽省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 安徽马鞍山 243000)

Bronze cymbals prevailed between the late period of Sa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Western-Zhou Dynasty. The cymbals found in Maanshan have many similarities both in sculpt and in decorations of the cymbals unearthed in Sang dynasty tombs, Xingan City. therefore, the date of which can be fix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Sang dynasty. The cymbals of Central plain was musical instrument, while it has distinct sacrificial character in South. After analysis on it's excavation place, we are sure it was most likely used for worshipping Changjiang River jins.

Key Words: Maanshan Bronze Cymbals Late period of Sang Dynasty Worship Changjiang River Jin

内容提要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纹饰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相似,因此,它的年代应与新干商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可定为商代晚期,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而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从出土情况分析,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卷云纹饰,以及出土地点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它的功能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

关键词 马鞍山 青铜铙 商代晚期 祭祀 长江神灵

中图分类号 K876.41 **文献标识码** A

2002年6月,在马鞍山市开发区的基建工地出土了一件罕见的云纹青铜大铙。出土地点在两山之间,其北为雨山,西北为宋山,宋山下即长江古河道。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对出土地点进行了调查、清理,未见其它文化遗物伴出。青铜铙为单独埋藏,既非墓葬,亦非窖藏。

青铜大铙气势恢弘,纹饰精美。其钲部为合瓦形,上宽下窄,甬(柄)素面,中空,并与腔体相通;铙的舞部素面(图一:1),钲的正鼓部饰阴刻勾连云纹和卷云纹组成的兽面纹,左右侧鼓部为对称的阴刻勾连云纹,钲的中部以阴刻卷云纹分为左右两部分,四周以连珠纹为界,内为阳线菱形雷纹,雷纹内填阳线卷云纹,在云雷纹的中央有突起的卷云纹围绕涡纹构成的变体夔纹,两夔又构成兽面的两目,正视其钲部又为一兽面纹,钲的下部和铙侧均为阴刻卷云纹(图一:2;图二:1)。与众不同的是,铙除外壁满饰纹饰外,在其腔内亦有纹饰,舞的内壁为阴刻勾连云纹,钲的内壁亦分为

左右两部分,以直线分为4组,内为勾连云纹(图一:3;图二:2)。铙通高52.5,钲高32.5、中长30.2、甬(柄)长20、径7、舞修32、舞广20、钲间41、铙间26.6厘米,重54公斤。

马鞍山出土的青铜大铙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唯一1件腔内有纹饰的青铜大铙,这无疑为商周时期南方青铜铙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探讨我国南方青铜铙的年代、性质和功能增添了新的数据。

由于对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特征和性质存在歧义,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冒昧提出肤浅的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一 青铜铙的系统

铙是商周时期重要青铜乐器,从目前出土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中原和南方两个不同的系统,亦可称之为小铙系统和大铙系统。

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主要出土于河南,尤以安阳殷墟最为集中,在殷墟的小屯、大司空村、侯家

庄西北岗、花园庄、郭家庄、戚家庄等地均有出土,其形体较小,可手执,往往以大小相次、3件或4件一组的编铙出现,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5件应为中原地区数量最多、断代最为可靠的一组编铙。此外在河南的洛阳、鹿邑等地,也出土过青铜铙。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中原系统的青铜铙,“除妇好墓编铙在形制纹饰方面存在不统一之处外,余者均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经仔细测算,这种大小相次是依照一个大致相同的比例规范铸造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妇好墓的5件编铙,在形制纹饰大致相同,……它们的总体形制与音高仍呈现有序排列,符合编列乐器的基本要求”^[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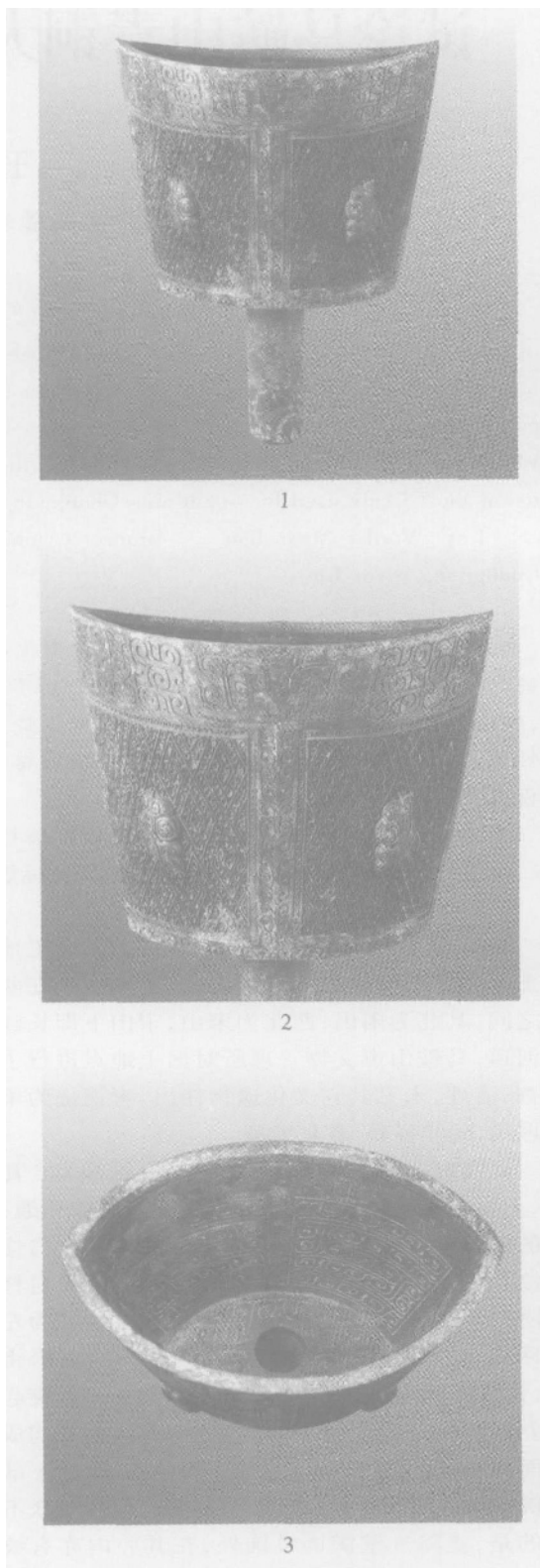
南方系统的青铜铙为大铙,在长江中下游均有发现。

青铜铙在长江中游主要出土于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周围,尤以湖南宁乡最为集中:1959年在老粮仓师古寨一土坑内出土了5件迭放的青铜铙^[2],1978年在老粮仓北峰滩出土2件兽面纹铜铙^[3],1993年在老粮仓师古寨出土了10件铜铙,其中9件大小相异、形制基本相同的乳丁纹编铙分三层迭放于一土坑中,这是目前我国出土最多的一次^[4];而1983年月山铺出土的重达221.5公斤的商代青铜铙,当为我国所知的最大的铙^[5]。此外,2002年在江西永修的一祭祀坑中,出土了2件青铜铙^[6],而1989年发掘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出土的3件青铜铙,是宁乡之外出土最多的一次^[7]。除此之外,湖南的湘潭、湘乡、岳阳、益阳、株洲、浏阳、醴陵、望城、金石,湖北的阳新、江西的宜丰,乃至广东的佛冈、曲江、潮阳等地,也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青铜铙。

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和安徽都曾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青铜铙:江苏的江宁在1974年出土1件云纹铙^[8];浙江的长兴在1959年和1969年各出土1件乳丁纹铙^[9];余杭在1963年出土1件兽面纹铙^[10];安吉在2004年出土1件乳丁纹铙^[11];温州在2004年出土一件乳丁纹铙^[12];安徽省博物馆收藏1件据传出土于潜山的云纹铙^[13];马鞍山青铜大铙是安徽有明确出土地点的1件;而福建的建瓯在1978年出土的1件乳丁纹铙^[14],是长江下游青铜铙分布的最南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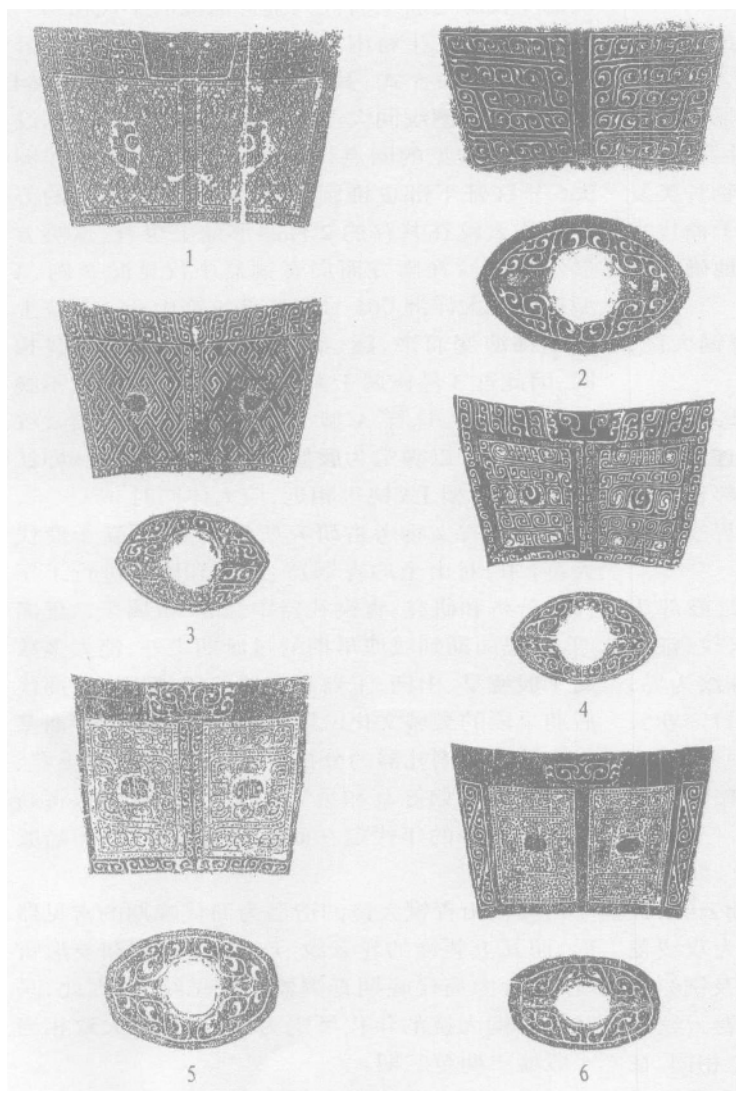
南方系统与中原系统的青铜铙差异显著,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除湖南宁乡师古寨三批和江西永修2件出自窖藏或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3件出自墓



图一// 马鞍山出土青铜大铙

1. 青铜大铙 2. 青铜铙钮部纹饰 3. 青铜铙腔内纹饰



图二// 青铜铙纹饰比较图

1. 马鞍山青铜铙外壁纹饰 2. 马鞍山青铜铙内壁纹饰
3、4、6. 新干商墓出土的青铜铙 5. 江宁横溪出土的青铜铙

葬外,其余青铜大铙都是单件出土。

2. 出土地点多为山顶或山前水边。

3. 尽管有成套的铙出土,尤其是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出土9件乳丁纹铙曾被认为是“编铙”^[15],但经研究,“这9件铙从音乐意义上不但非为一组编列乐器,也很难组合成为多组编列乐器”,这9件铙“礼制上有僭越可能,形制纹饰的不统一,更主要是音高、音列的紊乱无序,表明宁乡铜铙很难组合成一组具有音乐意义的编铙,也无法组合为多组编铙”^[16];而其它成组出土的铙,其形制各异,皆不成为编铙。

4. 形体高大厚重,一般通高40厘米以上,重40公斤以上,无法手执,而需插于座上敲击。

5. 纹饰繁缛,尤以云纹和乳丁纹最为普遍,在云纹之上凸起双目而形成特殊的兽面纹,与中原常见的兽面纹有异。

二 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

南方青铜铙的年代及其特征,早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高至喜先生的《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17]和《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铙的型式、演变与年代》^[18],施劲松先生的《我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19]等文都对南方青铜铙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也为研究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奠定了基础。

南方青铜铙大致可分为兽面纹铙、云纹铙和乳丁纹铙三大类。兽面纹铙主要集中于中游的湘江流域,长江下游偶有发现;从江西的新干至长江下游以云纹铙为主;而乳丁纹铙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有发现;长江下游的分布情况大致是北部(南京的江宁和马鞍山)多为云纹铙,南部(浙江和福建)多为乳丁纹铙。

与马鞍山相邻的是江苏的江宁县。在江宁横溪塘东村一土岗的顶部,出土了1件云纹六边形青铜大铙,出土地点处于宁镇山脉的西南,四周低山丘陵起伏连绵。铙通高46厘米,铙的舞部为卷云纹,鼓部为云纹构成的简化兽面纹,钲部以卷云

纹为中轴,将其分为两部分,四周为连珠纹,内为勾连卷云纹,卷云纹内填连珠纹,中部有一凸起的大目,目阴刻卷云纹,正视为一大兽面纹,铙侧亦为阴线勾连云纹(图二:5)。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出土地点与之相近,造型纹饰亦有较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如鼓部为卷云纹构成的兽面纹,钲部中间的卷云纹,以连珠纹为界纹,凸起的双目阴刻卷云纹等,因此两者的年代应相同或相近。江宁青铜大铙的年代,1975年发表的《介绍一件青铜铙》^[20]中定为西周早期,而在1997年出版的《南京博物院珍藏系列——青铜器》^[21]中,其年代改定为商代

晚期。

浙江的长兴、安吉、温州和福建建瓯出土的乳丁纹铙,余杭出土的兽面纹铙,与之可比性不大;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了青铜器、陶器、硬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等共计 1300 余件器物,在 475 件青铜器中,有大铙 3 件。其随葬器物种类复杂,数量众多,共存关系明确。通过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大铙的比较,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

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 3 件青铜大铙,编号分别为 064、065、066。

064 号为六边形铙,通高 41.5 厘米,鼓部为简化的阴刻兽面纹,钲部分为两部分,以连珠纹为界纹,内为双线卷云纹,内填连珠纹,中部各有一屈起的双目,正视为一大兽面纹。其连珠界纹与马鞍山大铙相同(图二 6)。

065 号为合瓦形铙,通高 43.5 厘米,鼓部为卷云纹构成的兽面纹,两侧为对称的卷云纹,钲部以卷云纹为中轴分为两部分,四周以连珠纹为界,内为阴刻卷云纹,并各有一凸起的双目,目饰卷云纹,钲下部和铙侧为卷云纹。其鼓部、钲中部、铙侧的卷云纹、兽面纹以及连珠界纹亦与马鞍山大铙相同(图二 4)。

066 号为合瓦形铙,通高 45.3 厘米,鼓中部为卷云纹构成的兽面纹,两侧为对称的卷云纹,钲的中部以卷云纹为中轴分为两部分,内为双线菱形雷纹,并各有一凸起的椭圆目,钲下部及铙侧为卷云纹。其鼓部、中轴、钲下部和铙侧的卷云纹和钲部的双线菱形雷纹,与马鞍山大铙完全相同。在南方系统青铜铙中,钲部主体纹饰为双线菱形雷纹者,仅此 2 件(图二 3)。

此外,马鞍山大铙上的卷云纹,是新干商墓中随葬青铜器的常见纹饰,连珠纹在新干大洋洲商墓中亦多见,在青铜圆鼎 004、青铜虎耳鼎 014、015、016、017、018、020、023、青铜方鼎 010、011、012、青铜鬲 034、035、037、青铜甗 038、青铜簋 043、青铜壶 045、046 等器物上大量出现,双线菱形雷纹除大铙外,还见于青铜甗形鼎 030、031;涡纹亦见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鼎 03、青铜簋 043、青铜豆 042 和青铜 063 等。

青铜铙在南方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与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合瓦形铙无异,其卷云纹、连珠纹、涡纹和菱形雷纹等为商代青铜器常见纹饰,因此,马鞍山青

铙的年代应与新干商代大墓青铜铙的年代相当。

施劲松先生将南方青铜铙分为四型,A 型(云纹铙)又分为 5 式,其中“A 型 I 式中大洋洲 064 号铙上的圆圈纹同大洋洲铜器上极普遍的连珠纹和陶器上常见的圈点纹相似。A 型 III 式中大洋洲 066 号铙钲下部也饰圆圈纹,钲部比较独特的方形勾连云纹在共存的 2 件甗形鼎上也有,这类方形勾连云纹在南方商周青铜器中仅见此 3 例。A 型 IV 式中大洋洲 065 号铙钲部纹饰由 064 号铙上的纹饰演变而来,隧、鼓部的纹饰与 066 号铙相同。因此这 3 件铙属于大洋洲铜器群,其时代不晚于殷墟二期。这样 A 型 I、A 型 III、A 型 IV 式云纹铙的时代可以确定为殷墟二期,A 型 II 式铙(即江宁铙)与 A 型 I 式铙很相近,应大体同时^[2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撰的《新干商代大墓》中,对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进行了年代的分析 and 研究。青铜礼器中,除少量属于二里岗期、二里岗期到殷墟早期的过渡期之外,绝大多数属于殷墟早、中期;玉器和陶器的年代相当于商代后期早段的吴城文化二期。“根据以上对新干商墓出土部分青铜礼器的分析,再结合出土部分玉器、陶器与殷墟妇好墓和吴城文化比较,我们拟将新干大墓下葬的年代定在商代后期早段,即相当殷墟中期^[23]。

马鞍山青铜大铙的造型为商代晚期的常见器形,而其上装饰的卷云纹、连珠纹、涡纹和菱形雷纹等,皆为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常见纹饰。因此,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年代可定为商代晚期,大致相当于殷墟二期至三期。

三 南方青铜铙的性质和功能

关于青铜铙,文献记载并不多。《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注:“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击止鼓”;《说文解字·金部》:“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从“卒长执铙”、“执而鸣之”等记载来看,应指中原系统的青铜小铙而非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亦表明中原系统的青铜铙为军旅乐器。

南方系统的青铜大铙,基本不见记载。其形体硕大,显然不能“执而鸣之”。从出土情况分析,亦非军旅之用,而是具有明显的祭祀性质。南方青铜大铙出土时几乎都是口朝上,甬在下,埋在地表下数十厘米至 1 米左右,通常是单独出土,而出土地点多在山顶或山前水边,因此大铙很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神灵的一种特殊的礼器。由于其祭祀的对象形体巨大,所以铙也往往形体硕大,或可称之

为“祭器”；由于其厚重，敲击时声音悠扬洪亮，并可在山川之间产生共鸣或悠远的回音，因此铙似可称之为“响器”而非乐器。

与南方其它青铜铙不同的是，马鞍山青铜大铙的腔内有纹饰，在铙的内壁和舞的内壁皆饰有阴线勾连云纹。这一罕见的现象，对探讨南方青铜铙的性质和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马鞍山青铜大铙内壁的纹饰十分规整，并且铙内和舞内的纹饰完全对称。纹饰的主要作用是装饰，在其内壁铸出纹饰，显然要比仅在外壁铸出纹饰的工艺复杂，这需在模上刻出精美的纹饰，还需在内外范上对这些纹饰进行修整。工艺是为功能服务的，采用如此复杂的工艺在内壁铸出精美的纹饰，显然应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从出土情况分析，绝大多数南方青铜铙的年代都在商代晚期。商人信鬼神，好祭祀，应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风气。在原始宗教中，即认为山水是有神灵的，山祭和水祭，始终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祭祀活动。在商人的祭祀活动中，即有祭山和祭水，只不过在南方形成了独特的祭祀形式，将山祭和水祭发展到极致。

青铜大铙应为古越人所使用，古越人是商周时期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号称“百越”，其祖先可能是由尧舜时期的三苗衍化而来。古越人有着有别于中原的自然神灵崇拜，如祭天、日、月、星、风、雨、雷、山、山神、山鬼、水、水神、湖神等，不同的祭祀物件应有着不同的祭祀仪式和祭祀器物。根据青铜大铙的分布情况，湘江流域最为集中，其次是赣江流域，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也应是其主要分布地域。但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内壁满饰卷云纹，而舞部却无纹饰，显然其功能与其它南方青铜铙有别。

马鞍山青铜大铙埋藏地点在低处，其使用时铙的位置一定很低，这样方可表现其内、外壁纹饰，而不需要表现舞部的纹饰；其它舞部有纹饰而内壁无纹饰的铙，如江宁青铜大铙埋藏在山顶，其在使用时位置一定很高，这样其舞部纹饰才有意义，而内壁则不需要铸出纹饰。换言之，如果内壁纹饰不在人的视觉范围之内，其纹饰也就失去了装饰意义。马鞍山青铜大铙的出土地点为两山之间，且距长江古道不远，因此推测其极有可能是祭祀长江神灵的。商代晚期青铜铙是否有山祭、水祭之分，今已无法知晓。

根据马鞍山出土的罕见的青铜大铙推测，南方青铜铙应存在两个大类：即外壁装饰类和腔内

装饰加外壁装饰类，或许可称之为祭山、祭水类。

马鞍山出土的青铜大铙有别于以往出土的青铜铙，其性质和功能也应有别于以往出土的青铜铙。至于其性质、功能的特殊性，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以期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和不吝赐教。

- [1]陈荃有：《宁乡老粮仓出土铜编铙质疑》，《文物》2001年第8期；另可参见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
- [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发现的几件铜器》，《文物》1966年第4期。
- [3]故宫博物院：《记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文物》1978年第6期。
- [4]《宁乡出土一批商代铜器》，《中国文物报》1993年7月4日。
- [5][23]益阳地区博物馆：《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第2期。
- [6][20]《江西永修发现商代祭祀坑》，《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20日。
- [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 [8]南波：《介绍一件青铜铙》，《文物》1975年第8期。
- [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长兴出土的两件铜器》，《文物》1960年第7期；长兴县文化馆：《浙江长兴县的两件青铜器》，《文物》1973年第1期。
- [10]王士伦：《记浙江发现的铜铙、釉陶钟和越王石矛》，《考古》1965年第5期。
- [11]周意群：《安吉发现一件西周时期铜铙》，《文物》2005年第1期。
- [12]《浙江温州瓯海西周土墩墓出土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12日。
- [13]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 [14]王振镛：《福建建瓯县出土西周铜钟》，《文物》1980年第11期。
- [15]长沙市博物馆、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老粮仓出土商代编铙》，《文物》1997年第12期。
- [16][22]陈荃有：《宁乡老粮仓出土铜编铙质疑》，《文物》2001年第8期。
- [17]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集刊》第2辑，1984年。
- [18]高至喜：《论中国南方商周时期铙的型式、演变与年代》，《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 [19]施劲松：《战国南方出土铜铙及甬钟研究》，《考古》1997年第10期。
- [21]张敏：《南京博物院珍藏系列——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